

守正创新 聚力前行

——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小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参会人员合影

冬日渐深，云冈石窟文物保护在传承中开启新程，在发展中获得新生。12月5日，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云冈研究院一楼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不仅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系统检阅，更是站在新的节点上凝聚共识、谋划未来的战略性会议。会议全面听取了基金会2025年度工作执行与财务收支情况的汇报，审议并规划了2026年的发展蓝图。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莅临指导并发表讲话。基金会全体理事、监事齐聚一堂，

共商发展大计。会议由基金会理事会副理事长温晓龙主持。

守正创新 行稳致远

会议伊始，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建勇发表了热情洋溢而又语重心长的致辞。他首先代表云冈研究院，对基金会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扎实工作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作为支撑云冈石窟保护、研究、传承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基金会的健康与活力至关重要。刘建勇特别强调了两大基石：资金监管与机构信誉。资金是公益事业的血液，必须

建立在阳光、透明的环境中，这就要求基金会的一切运作必须严守国家法律法规，建立并完善科学、严谨的内控制度，确保每一笔善款都来源清晰、使用规范。机构的信誉则是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它源于专业、诚信与公开。刘建勇勉励基金会不仅要做好“守成”的文章，更需积极“开拓”，主动拓展与社会各界的合作渠道，不断提升基金会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影响力与公信力。他最后表示，云冈研究院作为基金会的发起单位和业务指导单位，将一如既往地政策、学术、资源等各方面提供全力支持。

回顾总结 规划未来

在会议的核心议程中，基金会理事长赵昆雨系统、全面地汇报了2025年度工作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工作展望计划。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基金会在理事会的领导下，紧密围绕云冈石窟保护与研究核心需求，在课题资助、学术交流、公众教育等方面稳步推进，初步构建起规范化的运作体系。随后，秘书长曹保平就2025年度财务收支情况作了清晰、细致的汇报。

会议重点审议通过了2026年资助开放性课题、学术著作出版、专题展览以及香港众善堂捐助第7窟保养保护项目。香港众善堂项目是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专项保护工程，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云冈石窟的深情厚谊，也将为石窟的科学保护积累宝贵经验。会议还对相关

规章制度进行了讨论与审议，旨在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效能，确保各项工作在制度的轨道上高效运行。

监事长周宇超代表监事会发言，并围绕制度执行、风险防范等提出了具体监督建议。他表示，基金会2025年的各项工作，运作规范有序、财务管理清晰、项目实施合规，整体实现了稳健且良好的开局，充分证明理事会及秘书处的工作是审慎、扎实且富有成效的。同时，理事会及秘书处务必高度重视并有效落实各项建议与风险提示。

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在总结讲话中表示，本次会议召开及时、很有意义。在基金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次会议作出了前瞻性部署，理事和监事提出的意见切实有力。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基金会必将进一步提升影响力，成长为中国石窟寺公益领域的重要平台。

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务实、高效、充满信心的氛围中落幕。基金会所有理事表示，此次会议是一次总结经验的回顾，更是一个整装出发的新起点。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征程中，社会公益力量正以更加专业、规范、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肩负着神圣的文化使命，承载着各界的殷切期望。基金会全体同仁将继续秉持初心，守正创新，聚力前行，让千年云冈在当代的精心守护与传承中，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永恒光芒。

杭侃讲座《美美与共——云冈的壮美与优美》申城受欢迎



讲座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为助力《云海相望——云冈石窟艺术特展》在上海开展，12月6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在上海外滩美术馆作了一场关于石窟艺术之美的深度讲座《美美与共——云冈的壮美与优美》。

讲座中，杭侃以王国维与梁思成两位先生的视角为导引，开启了一场关于云冈之美的对话。他从王国维对“优美”与“壮美”的美学区分讲起，并提及梁思成作为艺术史家对雕塑的独到眼光。之后，费孝通先生的名言“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因与“大同”地名相契而被杭侃教授化用为主题。这不仅点明了讲座主旨，也寓意着云冈之美正在于多种美学特质的并存与交融。

在杭侃看来，云冈的“壮美”，根植于其皇家石窟的宏大属性。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以“真容巨壮，世法所稀”描绘云冈。梁思成则以建筑学家的敏感，从“因岩结构”四字推断窟前曾有木构窟檐。唐代记载称其“可受三千余人”，这种需从外部瞻仰的巨硕尺度，奠定了其神圣与威严。与敦煌不同，云冈罕有供养人题记。杭侃一语道破：“这好比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不会刻雕刻家的名字——云冈是国家工程。”个人功名在此隐去，凸显的是北魏皇权与神权合一的集体意志。

作为云冈的序幕，昙曜五窟的穹窿顶迥异于印度石窟。杭侃提到，学者杨泓先生曾推论其仿效的是草原游牧民族的穹窿顶，将王权威仪与宗教崇高融为一体。皇家工程的史诗气象，展现在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风格上。杭侃教授以第20窟露天大佛为例，形容其“双肩齐挺，很壮实”。他说，许多艺术家认为这尊佛气势磅礴，“用我导师白先生的话说，它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民族在上升时期的精神写照。”

北魏推行汉化，云冈艺术风格为之一变，从草原的雄浑转向中原的典雅，呈现出“穷诸巧丽”的优美特质。石窟形制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仿穹窿大帐，转向模仿汉地木构佛寺。中心塔柱、前后室、分层构图成为主流，中华建筑的美学开始主导空间。“双窟”的流行是另一特色。杭侃联系历史背景指出：“孝文帝继位时只有5岁，实权在冯太后手中。文献把他们两个并称‘二圣’。给‘二圣’造窟，自然就流行双窟。”第7、8窟，第9、10窟等，在形制、题材上彼此呼应，体现了当时微妙的政治格局。杭侃提到，第6窟是汉文化艺术的巅峰，被誉为“第一伟窟”。其雕刻极尽繁丽，数字化采集工作历时二十余年仍在进行。窟中摩挲居士身着汉式“褒衣博带”，坐于中式殿宇下，标志着佛教艺术与士大夫审美的交融。

谈到云冈的美，杭侃以第5窟的“最美胁侍佛”为例，引用李厚泽先生《美的历程》的观点：它让人感到被俯视与悲悯，却又“凛然若对神明”，产生一种距离感。杭侃从雕刻技法上作出分析，这种距离感源于“直平刀法”：“它不同于唐代的‘圆刀法’……就像用一把锋利的剑去削玉，所谓‘斩金削玉’。”这种简洁、刚劲、内敛的雕刻语言，塑造出超越人间、宁静深邃的精神世界，这正是北魏艺术“优美”的内核力量。

杭侃讲座中颇具启发性的一部分，是揭示梁思成对云冈艺术的独特评判，这与当下大众的审美认知形成了有趣反差。在《中国雕塑史》中，梁思成对云冈早期（昙曜五窟）的造像评价不高，认为其“平板无味”，过多模仿印度样式。然而，他却极力推崇云冈后期“秀骨清像”的风格，尤其欣赏那些衣褶飘逸、凌空飞舞的飞天，誉其为“我国雕塑史中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梁思成很不喜欢早期那种飞天，他喜欢那种很飘逸的……可现在所有游客都要在20窟大佛前合影。”杭侃笑言。这一对比生动揭示：美无定论，它因时代、学识与个人视角而流动。

作为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对石窟保护有着深切关注。他点出了“岩石艺术”的永恒悖论：为求不朽而择石开山，却也因此将杰作完全暴露于风雨侵蚀之下。

杭侃提到今年的超常降雨量导致第18窟渗水结冰，“云冈石窟大佛冻得流鼻涕”上热搜的实例，这直观展现了石窟保护的现实难题。杭侃介绍了，如今的石窟保护工作已从早期的抢险加固，转向更精细、更预防性的科学探索，甚至考虑通过模拟洞窟实验来测试保护方案，但石窟保护仍有许多困难与挑战在等待着被解决。

对此问题，现场特邀的石窟保护专家黄继忠教授补充道，石窟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其保护难度远大于博物馆馆藏文物。它与山体、岩石、水、空气及微生物紧密关联，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生态系统，因此石窟保护被认为是综合性最强、最为复杂的文物保护门类。长期以来，我国对石窟保护高度重视。早期工作的重点在于“抢救第一”，通过必要的工程措施解决石窟结构的稳定性问题，防止坍塌，保住了大量珍贵遗产。在稳定之后，风化便成为最严峻的挑战。然而，风化治理极其困难，其机理复杂，且任何保护材料使用不当都可能造成“保护性破坏”，因此必须基于扎实的研究，慎之又慎。在各种风化因素中，水害尤为关键且复杂，包括顶部渗水、地下毛细水、空气凝结水等多种形式。这属于特殊气候条件下的新挑战，保护机构正在积极研讨应对方案，力求将损害降至最低。石窟保护是一场与自然力的持久博弈，需要持续的投入与审慎的实践。

讲座最后，杭侃以一句“审美本来就是各美其美的”落下总结。正如他所说，云冈的壮美与优美，需要大家到山西大同亲自感受，方可真正体会。

爱心人士再度捐赠 助力云冈石窟保护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日前，香港众善堂有限公司负责人龙凤翔女士率团重访云冈石窟，并和云冈研究院举行捐赠签约仪式。

众善堂一行在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首先考察了正在实施保养的第5窟。看到洞窟内脚手架林立、修复工作井然有序，众善堂一行纷纷表示赞许。当行至第7窟参观时，目睹该窟严重风化、水蚀病害之危，当即发愿再捐赠50万元人民币，为保护好第7窟尽一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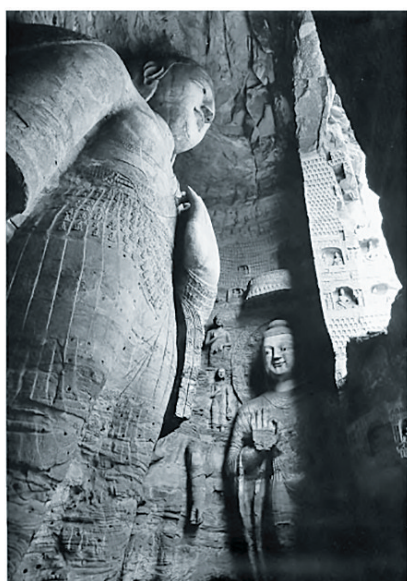
之后，双方在云冈研究院举行了签约仪式。山西省灵岩云冈石窟保护基金会理事长赵昆雨主持，云冈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何建国参加了签约仪式。

何建国说，众善堂继去年捐助修复第5窟后再次慷慨解囊，体现了中华儿女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大力支持。

从穹庐到殿堂

——漫谈云冈石窟洞窟形制变迁和有关问题（中）

杨泓



云冈石窟第18窟主尊大佛和右侧佛像



云冈石窟第19窟大佛

三

虽然我们已从陶骆驼模型的驮载物，认识了鲜卑族穹庐的构件，但是还难以复原其全貌。不过从圆穹形帐顶和围帐栅栏已可以看出，它的形制与周秦以来军中使用的帐幕并不相同。

在东周墓的出土遗物中，有青铜的帐顶，如山西太原春秋晋国赵卿墓和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陵中所见，形制大致相同。赵卿墓出土标本，通高17.6厘米，下面是圆筒状柱釜，上面是圆顶，圆顶周围设11个用于系结帐幕牵索的扁环。圆顶直径18厘米，柱釜直径7.6厘米，说明在帐幕中央有直径略小于7.6厘米、顶端可纳入釜内的立柱，形同当时殿堂建筑的都柱。这类帐幕张设起来后，周边没有直立的围墙，整体大致呈覆钵形，供行军作战中临时宿营之用，不宜用于长期生活居住。

直到汉代时期，战时军队行军宿营，仍沿袭旧俗，使用这样形貌的帐幕。在甘肃嘉峪关魏晋时期的墓室壁画中，还可以看到这类军帐的图像。古代在草原游牧为生的鲜卑族，虽逐水草迁徙牧场，但一般按季节有相当长的居留期，所以帐幕要适于人们在一段时间内的家居生活，其结构自然与军帐有所

不同。从陶骆驼模型所驮载的帐幕部件可知，它有栅栏结构的围墙，由栅栏横置于驼身侧的长度估计，墙高应超过1米。围帐上接穹状帐顶，因此民歌中称之为“穹庐”。圆穹形帐顶安置于穹顶中央，周边圆孔为系结帐幕牵索之用。但是这也只能是对穹庐形貌的大致推断，还是缺少真正能表述它的确切形貌的考古标本。这一缺憾终于在2000年得到补足，该年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发掘大同市雁北师院北魏墓群时，获得了陶质的穹庐模型，终于让我们见到“穹庐”的庐山真貌。

在雁北师院北魏墓群的2号墓中，出土了3件陶质的穹庐模型，其中2件平面呈方形，1件平面呈圆形。平面方形，卷棚式顶，上设两个天窗，并浮塑出开启调节天窗的绳索垂结于后壁。前壁中开一门，门两侧各开一方窗，左右两壁也各开一方窗。天窗和门开有孔洞，门上凸出的门楣，上设三个红色门簪。其余方窗仅在壁上刻划出窗形，并绘出红色边框。平面呈圆形，上部是圆形穹顶，下部是高10.4厘米的圆形围帐，围帐壁有宽6.2、高8厘米的门，门楣浮凸，上有两个门簪。穹顶中心是外径6.9厘米的圆穹形帐顶，帐顶周围向下连出13条弧形牵索，表明内帐顶相应为弧形帐杆，形成穹顶的支架。穹顶外表涂黑漆，牵索涂红色，其中9条下部绘有花形纹结。这件穹顶的圆形帐房模型，应是模拟当时鲜卑族的穹庐。不仅如此，出于对穹庐的喜爱，该墓群出土的一部分牛车模型的车顶一改西晋以来流行的卷棚顶，而变为穹顶，使整体车棚形成穹庐的形貌，也可以说将牛车改成了穹庐的穹顶。

2005年，在大同沙岭发掘了太延元年(435)破多罗氏父母墓，墓室右壁壁画以庖厨宴饮为题材，其中也绘有穹庐的图像，加深了我们对穹庐形貌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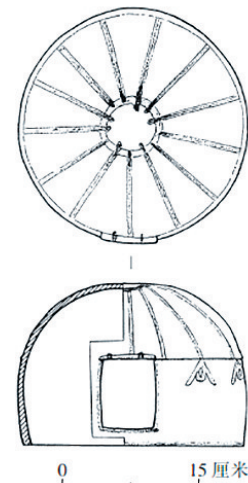
四

云冈石窟的开创，始于北魏文帝拓跋濬和平初。《魏书·释老志》：“和平初(和平元年为460年)，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当时平城城内佛寺的重要造像，皆为皇帝而建，如文帝复法之年(兴安元年，452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面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又：“兴安元年(454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高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云冈石窟第18、19窟平面均为椭圆形(或称马蹄形)，窟顶为穹隆顶



0 15厘米